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八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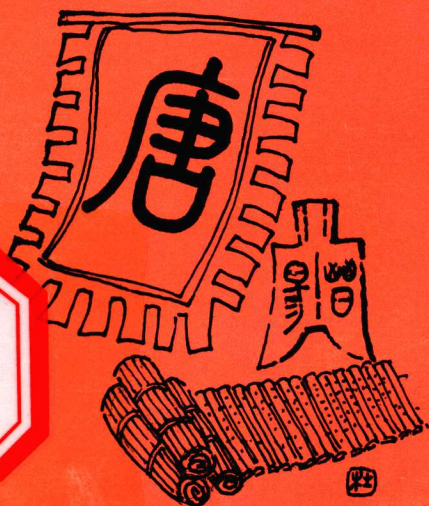
总主编/李玉明

《诗经》与三晋文化

程发贻

著

鲁迅先生曾指出：“《诗经》三百篇，皆出自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



5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武 静
复 审:周 红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与三晋文化/程发贲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3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8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752-0

I. 诗… II. 程…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②文化史-研究-山西省 IV. ① I207.22 ② 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384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八辑

《诗经》与三晋文化

程发贲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50千字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套

★

ISBN 7-203-04752-0

K·297 定价: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目 录

一、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诗经》	(1)
(一)《诗经》的产生	(1)
(二)《诗经》的内容	(3)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6)
(四)《诗经》传承和阐释	(7)
二、唐国与《唐风》	(8)
三、魏国与《魏风》	(12)
四、“兴、观、群、怨”	
——《唐风》、《魏风》的认识教育作用	(15)
(一)歌颂、支持变革	(16)
(二)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呼声	(19)
(三)战争创痛的呻吟	(22)
(四)劳动与生活的吟唱	(23)
(五)歌颂爱情、婚姻、家庭	(25)
五、“诗正而葩”	
——《唐风》、《魏风》的艺术特色	(28)
(一)“赋”法写出的华美诗章	(29)
(二)“乱花渐欲迷人眼”——比喻的妙用	(33)
(三)摇曳多姿的“兴”法	(37)
(四)因情立体——运用自如的表现形式	(39)
六、结语	(41)

太原工业学院图书馆

引 子

现今的山西省在上古时代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土壤疏松肥沃,加之黄河及其支流浸润着这里的大部分土地,气候更是温暖湿润,所以,上古时的山西地区一向以物产丰富而著称。尤其是其中的晋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膏腴,水利发达,交通便利,又盛产对人类生命有特殊意义的食盐,所以,很早就是古代先民繁衍生息的集聚地。正缘于此,晋南也就成为古代华夏民族集团为了生存而相互争夺搏杀的征战之地。根据传说及史籍记载,黄帝击败炎帝,杀死蚩尤的古战场在晋南,尧、舜、禹的都城在晋南,商族和周族的策源地也同在晋南。由此可见,华夏民族先民的领袖人物无疑是以晋南为基地,开创并向前推进了华夏文明。我国古代典籍《诗经》,就是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上古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则是反映了晋国国民在晋南这块土地上为生存而斗争、为生活而劳作、为文明而建设的历史脉落和文化场景。

一、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诗经》

(一)《诗经》的产生

《诗经》是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年间的诗歌作品,现在通行本《诗经》的成书年代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诗经》中的诗篇来自广阔的地

域,鲁迅先生曾指出:“《诗经》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决非是主要的。《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内容反映了周朝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堪称周王朝的社会百科全书。

唐国(后改称晋国)和魏国都是周朝初期分封的诸侯国,采自这两个诸侯国的诗歌称为《唐风》和《魏风》,它们是《诗经·国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诗经》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自己的特色。唐、魏“二风”反映了唐国、魏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民生、民情、民风,保留了唐国、魏国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这既是我们研究周初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史料,也是我们研究三晋文化的重要资料。

当然,要想准确、深入地认识《唐风》、《魏风》,必须对《诗经》有个总体的把握和了解。

那么,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为什么会出现在周代,而不是此前的夏代和商代?这是因为,第一,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为《诗经》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周初是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周部族所处的岐山之南,沃野千里,农业生产相当发达。周王朝建立后,又采用了殷人的青铜技术,随后又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使得周代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分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告诉我们:“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周代的文化繁荣,同样是建立在广大奴隶辛勤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是奴隶制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

其次,周初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是《诗经》产生的政治条件。殷商末年,奴隶主贵族生活腐化,政治腐败,到了末代昏君纣王之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们的盘剥重压之下,

下层百姓怨声载道。当周武王的联军在牧野与商王的军队展开决战时,商王的士卒在战场上纷纷倒戈,终于使殷商王朝溃败灭亡。周初统治者有鉴于此,不得不实行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强调德政,提倡以礼治国,形成了周朝初期安定宽松的政治局面,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第三,继承和发展唐虞文明,是《诗经》产生的文化背景。商族的始祖契,周族的始祖弃,都是上古尧舜时代的人,长期活动在晋南一带。弃成为周族的部落首领后,舜封弃于“邰”(táo,又称豳,在今山西闻喜、稷山一带)。弃又称后稷。后稷死后,他的儿子不窋因躲避夏朝的太康之乱,率领部落西渡黄河,最终定居在今陕西岐山一带。周部族长期生活在尧天舜日之下,继承和发展了唐虞文明。比如,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在商代就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西周时期则更加成熟,书写更加方便,为《诗经》的产生提供了直接有利的书写手段。

第四,采诗和献诗制度是《诗经》产生的历史契机。据记载,周朝廷设有采诗官吏,叫做“行人”或“邶人”。他们四处访搜民歌,以供君主考察民情风俗和政治得失。周朝还有献诗制度,要求公卿士大夫有目的地作诗,在一定场合献给周王,让朝廷了解政策的得失。这两项制度便为各地诗歌汇聚于朝廷提供了顺畅的渠道。据说,直到春秋时期,由采诗献诗所得的诗章共有三千余篇。

(二)《诗经》的内容

流传下来的《诗经》篇章,是由周王朝的乐官即音乐专家选定、整理、编辑的。《诗经》在其编定之初称为“诗”、“诗三百”,司马迁《史记》又称之为“诗三百篇”。这三百多篇诗真正地被奉为经典——《诗经》,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从那时起,《诗经》便被作为这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沿用至今。

根据史料记载,《诗经》中的诗篇在春秋时代已经在贵族阶层内广为流传,并被普遍应用在祭祀朝会的各种典礼上和贵族社交活动的各种礼仪中。不仅如此,列国人士还把《诗经》中的诗句应用于社会生活和政治交往之间,作为一种特殊的通情达意的工具,即用比喻和暗示的方法传达各自的立场和意见。《左传》和《国语》中大量赋诗言志的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当时贵族学校里,教授《诗经》中的诗篇就成为必须学习的重要科目。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曾给过《诗经》以很高的评价。据《论语》记载,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诗”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可以观察社会和生活,可以指导人际交往,可以发泄不满,可以侍奉父母和君主,还可以多多地认识鸟兽草木之名。也就是说,《诗经》是知识的汇集,是政治理论的凝结,是感发人的道德情操和表达思想感情的资源,是语言修辞的宝典。孔子之后,孟子、荀子也时常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都直接启发了《诗经》在汉代的经学化。

汉代独尊儒学,孔子被奉为圣人,他曾校正过的《诗经》被列为“五经”之一。两千多年来,《诗经》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传统教材之一,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原是一部乐歌总集,仍保留着原初诗歌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特色。《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调失传,习《诗》者不能歌舞,只能讽诵了。

现存《诗经》总共 305 篇,也称 311 篇,这是包括了“小雅”中的 6 篇“有目无辞”(有标题无诗句)的“笙诗”,即只可用来

奏乐的诗。全诗根据音乐特点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土风,就是本乡本土的乐调,或叫地方乐调。《诗经》中有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guì或kuài)、曹、豳(bīn)等15国风,共160篇。其中《魏风》7篇、《唐风》12篇,是上古三晋地区的土风。“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把王畿地区的音乐视为雅乐、正声,即典范的音乐。王畿指都城及其周围地区,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其语言称正声、雅言,宫廷与贵族所用的乐歌即为正声正乐。“雅”诗又分“大雅、小雅”,是以音乐的不同产地及时间远近而区分的。“雅”诗共105篇,“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即古代的“容”字,可译作“样子、外表”,即表演的意思。可见,在上古时期诗与舞是分不开的。也有人认为,在古代,颂、庸为通假字,庸即镛,是一种大钟,其声调缓慢、庄重,余音袅袅,类似于今天宗教仪式中的乐器和乐曲。这又说明,在古代,诗与乐也是分不开的。“颂”分周颂、鲁颂、商颂,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研读《诗经》,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诗经》堪称雄浑昂扬的周族史诗。诗歌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产生于文字之前。上古时期,没有文字,人们记事以口耳相传。为了方便记忆,有利传播,人们就把有关事项编成有韵律而长短整齐的句子,这便是后来所谓的古诗。所以,诗歌本是用来记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便是以诗歌形式记述周族文明史的史诗。在“大雅”中,有一组古老的祭歌,叙述了周族的起源、发展,以至建国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古代传说、历史事件,赞颂了周族的著名英雄,这无疑是周民族艰苦创业、坚韧前行的历史记录。

在“大雅、小雅、国风”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诗篇表现了现实政治斗争、艰难而危急的时势,以及统治者的道德沦丧。对

于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诗人们便热情而又不乏机智和幽默地运用诗歌的形式,予以批评和讽喻,以达到挽救国家命运、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目的。如《唐风》中的《扬之水》和《魏风》中的《园有桃》等。

《诗经》中还有许多篇章描绘了那个时代以农耕为中心的丰富多彩的劳动景象,抒发了与劳动相关联的时而欢乐、时而悲哀的情绪。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和《十亩之间》。还有很多诗歌描写了爱情、婚姻及家庭生活,如《唐风》中的《绸缪》、《葛生》,《魏风》中的《汾沮洳》等。另外,庙堂乐章、宴飨诗篇也是《诗经》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它所创造的“赋、比、兴”的诗歌表现手法。总的来说,“雅、颂”之中使用“赋”的手法较多,“风”则以“比、兴”见长。此外,《诗经》还使用了许多其他的修辞手法,如复迭、对偶、夸张、示现、呼告、设问、顶真、排比、拟人、借代等等,使它的诗歌作品更加摇曳生姿,异彩纷呈。

就章法而言,《诗经》大量采用了回环往复的形式,更多地体现了民歌的特色。在句式上,基本是整齐的四言,少数也有二至八言,但给人总的印象是,句式以合于自然为主,不受句式的拘束。在语言的运用上,那种精深的表现力,达到了高超的成就,为后世所瞩目和效仿。在诗韵上,是“矢口(开口、随口)成韵”,自然和谐,但自身也有规律,为后世的诗歌韵律树立了典范。上述这些特点在《唐风》、《魏风》各篇中也很突出。

总之,《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既标志着中国诗

史的发端,又以其巨大成就和鲜明特色,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诗经》传承和注释

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诗》、《书》是焚毁的重点。《诗》经过了秦火而没有湮灭,主要是依赖了口耳相传,也就是老师讲述,学生记诵。

到了汉朝初年,传授和讲述《诗经》的共有四家:齐人轅固的《齐诗》,鲁人申培的《鲁诗》,燕人韩婴的《韩诗》,以及《毛诗》。前三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字体书写,所以称为今文经。今文即当时的文字。但这三家《诗》已先后亡佚。《毛诗》用古文书写成,所以称为古文经,古文即先秦的古文字。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诗经》就是《毛诗》。

《毛诗》相传出于孔子弟子卜子夏,正统儒生还认为子夏撰写了解释各首“诗”主题的“小序”及概论全部《诗经》的“大序”,合称《毛诗序》,或称《诗小序》、《诗大序》。由秦汉之际的鲁人毛亨作注(解释字义),由汉朝初期的赵人毛萇作传(解释文义),所成之书叫《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这是第一部系统注释《诗经》的书。汉代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都是研究《毛诗》的学者。郑玄著有《毛诗传笺》,简称《郑笺》。《郑笺》以《毛诗》为主。郑玄又著有《诗谱》三卷,依据《史记》年表和《春秋》有关史实,列举各诗先后次序,论说《诗经》各部分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风土人情的关系。

到了唐代,孔颖达著有《毛诗正义》40卷,主要疏解《毛诗》和《郑笺》,汇集魏晋南北朝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在宋代主要有朱熹的《诗集传》,用浅近的文字疏通句意、段意,所说与《毛诗序》多有不同,打破了历来对《毛

诗序》的迷信。清代及近现代研究《诗经》的大有人在,名家和名著很多,都是我们研究和学习《诗经》的重要资料。

二、唐国与《唐风》

《唐风》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一。唐风指唐国的土风,亦即唐地的地方曲调或唐国的民歌。那么,唐国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历史变迁又是怎样?唐国对《唐风》有过哪些影响呢?

“唐”指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唐尧之唐。据传说,尧 15 岁受封于唐地,为唐侯。当时的唐地指黄河以东广大地区,其疆界南至夏县,西临黄河,北到霍山,东达翼城,比临汾盆地大一些。尧的部族就长期活动在这片沃土上,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直至尧成为“天子”,即中原方国联盟的盟主。据记载,尧帝让位于舜,他的儿子丹朱被舜帝封于丹陵,到禹帝时,又封丹朱的后裔于唐,这就是古史上的诸侯方国之一的唐国。

关于古唐国的历史,《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说:在帝舜时代,陶唐氏有个后裔叫董父,因为擅长养龙而得到舜帝的赏识。舜帝就封给他土田,赐给他姓氏。到了夏代,又有一个叫刘累的后人,也是因为擅长养龙而在朝做官,叫御龙氏,后来因为得罪朝廷而潜逃。到了商代,刘累的后人又返回唐国做了国君。西周王朝建立后,帝尧的后裔就被封于其世代聚居的唐国为国君。

周武王在位 2 年后去世,年幼的周成王继位,由其叔周公旦摄行政事。武王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怀疑周公有篡逆之心,就勾结商朝的遗民发动叛乱,唐国的贵族也参与其中。于是,周公奉命东征,历时三年,最终平息了叛乱。唐国君主因为参与叛乱,失去了封国。唐国的地方,被改封给了在

平息叛乱中立有战功的周成王的弟弟叔虞。

说到叔虞封唐,有个流传很广的“桐叶封弟”的故事。据说,就在周公出兵东征,灭亡唐国期间,成王跟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圭形给了叔虞,说道:“用这封你。”在旁边的史佚就请成王选个好日子封叔虞为诸侯。成王解释说:“我是在开玩笑呢。”史佚则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一说话就有史官记载它,用礼仪完成它,用乐章歌唱它。”最终,成王就把叔虞封到唐国,史称唐叔虞。

唐国历史悠久,号召力强,对周边国家影响很大,没有重臣镇守,王室怎能放心? 为了表示对叔虞的厚望,成王特地在镐京举行了盛大的封唐典礼,赏赐给叔虞很多珍宝,并派遣了许多官员帮他组成了新政权。此外,周公还根据唐国的历史及其邻近戎狄的特点,为新唐国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特殊政策,意即让叔虞用夏人的传统之政启迪诱导夏民,用戎人的规矩约束、驾驭戎人,依照戎人的习惯与唐国东、北部的戎狄游民交往。这样的大政方针对唐国来说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么,唐国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史记·晋世家》说“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这里所说的“河”是黄河,“汾”是汾水。黄河、汾水之东,方圆百里,只能是晋南的翼城、曲沃、绛县、襄汾一带。唐国的都城先是在翼城县西 10 公里的里砦镇唐城村。据旧县志记载,叔虞封唐时,把都城迁到了翼城县南唐乡龙唐。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又迁到了翼城东南的故城村。1958 年,在翼城的北常、涧峡、南庙、故城等地,发掘出土了一批较完整的春秋时的古器皿和一些破碎的青铜器片。就在发掘这些古文物的地方,还发掘出了一座古城旧址。有关专家认为,从这座古城遗址的结构形式和占地面积来看,它是春秋后期的诸侯领地城。此外,在翼城的苇沟、天马等地还发现了

大量春秋时的文物,这些都是唐国、晋国建都翼城的物证。《唐风》各篇中出现的黍、稷、稻、粱等农作物,以及桑、榆、椒、杜(杜梨)等树木,至今在翼城、曲沃一带仍然广泛种植,也是唐国在晋南地区的佐证。

燮父做晋侯时,改国号唐为晋,这一国号沿用了近 600 年。为什么改唐为晋呢?一般认为“唐有晋水”,因晋水而改为晋国。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传统说法。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晋”字起源较早,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它的构形像一件器物里放了两支竹箭,应是箭字的古文。从训诂学上讲,“晋”确有进意,后世说的“晋升”、“晋谒”也都含有由下而上的意思。从文字通假上讲,“搢”是“晋”的孳乳字。“搢绅”起初作“荐绅”,说明“搢”、“荐”是通假字。总之,“晋”、“搢”、“荐”实出一源。“荐”本意是草席,后来把祭神祀天时进献的美味叫荐羞,可见,“晋”字造字本义是取器中盛物献于神灵之意。《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上天赐降大福,唐叔获得了特殊的禾苗,献给成王。”这似可作为燮父改唐为晋的史证。在迷信上帝的上古时代,人们往往把自然界的异常现象视为上帝所降的灾难或祥瑞。对于刚刚灭商而取得政权的西周王室来说,唐叔虞进献嘉禾,对于新王朝的统治者肯定在一种莫大的慰藉。燮父继位为君,为了纪念先君叔虞晋献“嘉禾”的功绩,就将国号改为“晋”。

叔虞受封于唐,开创了晋国的巍巍大业。晋侯燮父之后,又经历了六世,至晋穆侯费时迁都绛邑(现翼城县的天马一曲沃县的曲村一带),史称故绛。穆侯死后,穆侯之弟殇叔自立为君,太子被迫出亡,使嫡长继承制第一次受到冲击。4年后,太子夺回君位,这就是晋文侯。文侯死后,其子昭侯即位。昭侯将其叔成师封于曲沃,史称桓叔。桓叔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心归顺,经济发展,67年后曲沃武公取代了晋侯

缙,彻底冲垮了嫡长继承制。这在《唐风》中就有明显反映,形成了《唐风》特有的叛逆特色。

周公旦为唐叔虞制定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深深地影响着晋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尤其是直接规定了晋国文化的发展格局,使晋文化具有异常鲜明的独立个性,具体来讲至少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晋文化的异端色彩。对于传统的宗法制度,晋文化既不像鲁文化那样全面维护,也不像齐文化那样折衷兼顾,而是从根本上全面批判否定。这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如《唐风》中的《扬之水》,居然歌颂敢向公室夺权的曲沃桓叔;又如《唐风》中的《鸛羽》,借役人之口提出“悠悠苍天,曷其有极”的质问,直接向“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挑战,这在《唐风》以外的其他“风诗”里是不多见的。

其二是晋文化的进取精神。晋文化对传统宗法制度的批判,绝不是没落阶级的消极沉沦,而是表现了新兴封建势力生机勃勃的开拓进取精神。这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如《唐风》中的《蟋蟀》,作者既同情人们的“及时行乐”,又苦口婆心地劝人“职思其居”、“职思其外”、“职思其忧”,要“好乐无荒”,这种精神状态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所没有的。

其三是晋文化的忧患意识。在曲沃桓叔历时 67 年的夺权斗争中,晋昭侯以下五代国君接连被杀。如此旷日持久而又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即使在频频发生弑君篡位的春秋列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如《唐风》中的《杕杜》,作者以寓言表现了“公室”的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表示了人们对变革的支持;另一方面,如《唐风》中的《采苓》,号召人们不要听信谣言,以免谗言误国,陷国家于混乱之中,陷人民于灾难之中。这些对于一般士大夫和人民的真实思想感情的表现,在其他“风诗”里也是为数不多的。

从《唐风》12篇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反映的历史事件及社会现实都是燹父改“唐”为“晋”以后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唐风》即是《晋风》。但是,为什么不称《晋风》而称《唐风》?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其地土脊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其诗不谓之晋而谓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但是,这也只说对了一部分。叔虞封唐后,周公为其制定的治国方略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不改《唐风》为《晋风》就是要从《唐风》中反映的“尧之遗风”,启示统治者只有尊重唐人的习惯法规,才能治理好唐国。同时,唐国参与了武庚叛乱,虽然唐国的旧贵族已被迁走,但不能说已经彻底消除了不安定因素。所以,不改《唐风》为《晋风》,就是使治国者常以《唐风》反映的风土民情警示自己,做到勤政爱民、防患未然,使晋国真正成为周王室的藩屏。

三、魏国与《魏风》

《魏风》也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一。魏指晋国的魏地和三家分晋后的魏国,风为地方曲调。《魏风》就是魏国的地方曲调或魏地的民歌。

魏氏原是晋国的六大卿族之一,其先祖是周文王的庶子姬高。武王伐纣后,封姬高于毕(现陕西咸阳市北毕原),与西周国都镐京相近,于是以毕为姓,亦称毕公高。他的后世子孙被断绝了封爵,成为平民,有的与边境少数民族杂居,有的活动在晋南地区。春秋时期,毕公高的后裔毕万为晋国大夫,很受晋献公的赏识,是晋献公的重臣。献公在位时大举对外兼并,先后吞灭了许多周边国家。晋献公十六年,赵夙、毕万护卫献公攻打霍、耿、魏等小国,一举歼灭之。毕万被授予大夫称号,并受封于魏地。

古魏国在夏商时代就存在了，本为姁(gū)姓，故址在芮城县北五里的龙泉村、柴村之间。武王克商时，古魏国被消灭，周天子将其姬姓子弟封在这里。所以，魏也是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国，其故都在现芮城县古魏(原城关)镇王窑村一带。上古时候，诸侯国被攻灭，只变换国君，国号一仍其旧，叔虞封唐是这样，姬姓子弟封魏也是这样。毕万受封十一年后，按照其封邑的名称改魏姓，这就是晋国魏氏卿族的来源。毕万的儿子季芒生魏犇(chōu)，号魏武子。魏武子是晋公子重耳的五贤士之一。晋献公晚年发生了骊姬之乱，魏武子随从重耳出亡在外19年，是重耳的亲信。重耳即位后，让魏武子继承魏家之嗣，列为大夫，以魏邑为治所。武子有三个儿子，长子悼子承袭父爵，将治所由魏迁至霍(今山西省霍州市境)。

魏悼子之子魏绛，号魏庄子，为晋悼公时大夫。晋悼公力图重振霸业，任用魏绛当政，魏绛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对晋悼公的霸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著名的“魏绛和戎”，开创了古代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范例。悼公后来无比感慨地说：“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狄，魏子之力也。”魏绛承袭父爵后，又将治邑由霍迁到今夏县境内的安邑。从此，安邑成为春秋时代魏氏卿族势力的大本营和战国时代魏国霸业的策源地。

魏绛之子魏舒，号魏献子，承袭父爵。魏氏势力在献子期间获得重大发展。晋顷公时代，魏献子登上了卿位，居六卿之首为正卿，执掌晋国国政，推行了具有封建内涵的县制，从此“晋益弱，六卿皆大”。魏献子之子魏取，号魏简子，简子生魏侈，号魏襄子。晋定公时，魏襄子与赵、韩、智氏联合攻灭范、中行氏，晋国六卿专政局面由四卿取代。魏襄子之子魏驹，号魏桓子。桓子与赵、韩、智氏共分范、中行氏之地为邑，晋国为四卿所瓜分。晋哀公时代，魏桓子又与赵、韩二氏攻灭智氏，